

中国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1978 - 2004

钞小静 任保平

摘要: 公共支出总量反映着政府介入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规模与深度,体现了政府的成本支出。但是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而且也体现在结构关系上。作者对中国 1978 - 2004 年间相关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表明,中国公共支出的产出弹性为正,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从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国防支出及其他支出的结构产出弹性为正,行政管理支出结构产出弹性为负。公共支出结构的优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当前在提高公共支出总水平的同时,应注意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率。

关键词: 公共支出 公共支出结构 经济增长 结构产出弹性

一、问题的提出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公共支出规模明显扩大、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不断提高。针对这种趋势,许多学者对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Peacock and Wiseman, 1961; Musgrave, 1969; Arrow and Kurz, 1970; Rostow, 1971),试图为政府政策的选择与制定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大多数学者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是否有影响、是否有持久的影响、作用的方向和程度等问题上,但这些研究并没有达成共识。20 世纪 80 年代末,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开始复兴,公共支出结构的优化就成为一个难以忽视的问题。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GDP 以年均近 10% 的速度增长,资本、劳动等要素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政府的作用无疑也是举足轻重的。那么政府职能的发挥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和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公共支出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又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公共支出结构调整的依据是什么?这将成为本文分析的基本内容。

二、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公共支

出的总量关系与结构关系两个方面。西方经济学家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主要研究的是公共支出总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关于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则基本起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这些研究使用不同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来检验和比较不同公共支出结构对产出或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一般采用跨国分析,进行实证检验。一部分经济学家,如 Kormendi 和 Meguire (1985),Grier 和 Tullock (1987),Aschauer (1989),Barro (1990),Fischer (1993) 等把政府公共支出划分为公共消费性支出(或非生产性支出)和公共投资性支出(或生产性支出)两部分,研究这两种支出的绝对规模与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关系。Kormendi 和 Meguire (1985)研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47 个国家的政府“消费”支出,结论是政府消费性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Grier 和 Tullock (1987)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包括 24 个经合组织国家在内的 115 个国家的模块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政府消费性支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而政府投资性支出则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环境,具有正的效应。Barro (1990)利用 98 个国家的数据进行经验分析,认为政府消费性支出增加会扭曲资源配置,导致人均经济增长率下降。他还认为具有生产性的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决定于公共支出规模的大小。若其尚未达到最佳规模,生产性支出的增加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的影响,而当超

过最佳规模之后就会产生负的影响。还有一部分学者如 Easterly 和 Rebelo (1993), Devarajan、Swaroop 和 Zou (1996) 同样将政府公共支出划分为生产性与非生产性两个部分,但他们着重讨论了公共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Easterly 和 Rebelo (1993) 认为公共投资性支出比重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正向关系,特别是投资于交通、通讯的支出与经济增长相一致。Devarajan、Swaroop 和 Zou (1996) 对 1970 - 1990 年间 69 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进行经验分析,指出在最优状态下,生产性公共支出与非生产性公共支出的比值应该取决于这两项支出对生产的贡献度(产出弹性)之比。生产性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然而当其所占的比例过高时,它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在边际上就成了负的,而非生产性支出对平均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是负向的。以上研究主要是对跨国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不是从一国实际的背景出发,不一定适用于某一特定国家的具体情况。而且把公共支出按照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来进行划分会带来两个方面的问题:(1) 这种划分方法标准不够明确,使得判断各支出项目是生产性还是非生产性成为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从而导致实证分析的结果截然不同;(2) 这样的划分方法太过笼统,不能明确而具体地表明公共支出在各职能间分配的格局和各项职能实现的程度,对于实际财政政策选择与制定的指导性较弱。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内经济学界开始研究公共支出问题,主要是从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视角来研究公共支出的规模问题。一些学者依据西方公共支出的相关理论来研究中国公共支出调整的方向(牟放,1999;吴晓、元同进,2001),而绝大多数的学者主要通过公共支出国际间的比较来对中国当前的公共支出结构状态进行评价与分析(余天心、王石生,1997;王雍君,1999;马栓友,1999;王军,2002;谢瑞,2002;陈颂东,2004)。单纯与经济发达国家比较有助于我们发现自身不足,但却忽视了中国实际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中国具体的体制演进状况,而且这样的方法只是理论上的推导,并没有具体实证分析的支撑。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专门研究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成果在中国并不多见,郭庆旺(1991)、赵志耘(1994)构建了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模型,但是并没有进行经验分析。邹薇(2003)从“调整成本”入手,对中国公共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公共支出的调整成本急剧上升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削弱了中国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度,

但是她研究的重点在于调整成本对公共支出拉动作用的影响,而且也未涉及具体的公共支出结构。孔祥利(2005)利用斜率关联模型,以中国 1996 - 2003 年为样本区间计算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程度,但是他所选取的样本十分有限,而且也未具体分析公共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刘溶沧和马拴友(2001)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包含私人投资、公共投资、国防支出、经常性支出、国债、劳动增长率与教育或人力资本在内的模型,但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未成为其分析的重点。

以上理论与经验分析表明公共支出不是一个简单的外生变量,它会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持久的影响,因此对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然而从国际上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对公共支出总量及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问题的研究都缺乏有效的实证检验支撑。现有的实证分析主要采用的是跨国分析的方法,这种分析方法使得主要变量不易控制,所得分析结果在特定时点、特定国家的作用非常有限;而且按照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的标准对公共支出进行划分存在着诸多问题。中国对于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是从公共支出总量规模上进行的,很少有学者从公共支出的结构上来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从中国当前公共支出的现状来看,不仅需要研究公共支出的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且更应关注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是分析两者之间关系不可或缺的研究思路。基于以上研究现状和当前现实的需要,本文着重从公共支出结构入手,来分析公共支出各具体支出项目比重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而为中国公共支出结构的优化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三、相关问题的明确与基本状态的统计描述

(一) 相关问题的明确

1. 公共支出结构类别的选择

中国的公共支出分类的办法有两种:一是编制国家预算采用的分类法,即按支出用途分类,此种方法在财政统计公报上称之为按支出项目分类;二是以政府职能为标准进行分类,将公共支出分为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国防费、行政管理费及其他 5 大类。按职能划分的公共支出结构形态是研究公共支出结构中最常用的方法,各项目具有比较单一的目标、功能或利益,可以明确而具体地表明公共支出在政府各职能间分配的格局和各项职能实现的程

度,并且可以从动态上反映出各项财政职能在不同时期变动情况和公共支出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上侧重点的变化。出于研究目的考虑,结合统计资料收集的可能性,本文也采用这种方法。

2. 合理的公共支出范围与公共支出结构

公共支出的职能是政府职能的一部分,因此对公共支出范围的界定离不开对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由于公共支出会影响到社会的总供求,在市场已经实现有效配置的情况下,政府是不应当介入的。正如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的那样,凡是市场机制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财政应该退出;凡是市场机制无法或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财政才应介入。由此也就决定了合理的政府公共支出的范围应当限定在市场失灵的领域之内。

公共支出结构实质上体现了公共支出的内部比例关系是否合理,不仅关系到政府能否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的职能作用,而且影响和决定着整个国家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因而公共支出结构的优化是公共支出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公共支出结构状况既与一国经济体制和相应的政府职能有关,又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要求公共支出的侧重点不同,其具体演变的历史轨迹为:从维持性服务开始,首先扩展到经济性服务领域,然后进一步扩展到社会性服务领域;与此相适应,维持性支出比重逐渐下降,经济性支出比重逐步上升,然后这两者都逐渐下降而社会性支出比重明显提高。

中国目前处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并且经济体制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所以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财政活动的范围要大得多,而且偏重于经济性支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由于采用经济体制的不同以及具体的社会的、政治的、历史的原因,中国公共支出所涉及的领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基于此,对于中国合理的公共支出范围与公共支出结构的界定应该从中国经济体制及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出发来进行判断。

(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共支出基本状态的统计描述

1. 公共支出总量的统计描述

任何公共支出结构都是在一定的公共支出总量下形成的,中国公共支出总量的基本变化情况如表 1 所示。自 1978 年以来,中国公共支出总量规模一直呈快速增长的趋势(见图 1),至 2004 年时已经达 28 486.89 亿元,是 1978 年 1 122.09 亿元的约 25 倍。然而就相对规模来看,公共支出占 GDP 的比重,却

不同于这一趋势(见图 2)。从 1978 年到 1995 年这一比重一直是逐年下降的,由 1978 年的 31 % 下降到 1995 年的最低水平 11.7 %,在 1994 年实行财税综合改革后,这一比重停止下降,并在 1998 年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后出现明显上升趋势,至 2004 年达 20.8 %。

表 1 中国 1978 - 2004 年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公共支出 (亿元)	GDP (亿元)	公共支出占 GDP 的比重 (%)
1978	1 122.09	3 624.1	31.0
1979	1 281.79	4 038.2	31.7
1980	1 228.83	4 517.8	27.2
1981	1 138.41	4 862.4	23.4
1982	1 229.98	5 294.7	23.2
1983	1 409.52	5 934.5	23.8
1984	1 701.02	7 171.0	23.7
1985	2 004.25	8 964.4	22.4
1986	2 204.91	10 202.2	21.6
1987	2 262.18	11 962.5	18.9
1988	2 491.21	14 928.3	16.7
1989	2 823.78	16 909.2	16.7
1990	3 083.59	18 547.9	16.6
1991	3 386.62	21 617.8	15.7
1992	3 742.20	26 638.1	14.0
1993	4 642.30	34 634.4	13.4
1994	5 792.62	46 759.4	12.4
1995	6 823.72	58 478.1	11.7
1996	7 937.55	67 884.6	11.7
1997	9 233.56	74 462.6	12.4
1998	10 798.18	78 345.2	13.8
1999	13 187.67	82 067.5	16.1
2000	15 886.50	89 468.1	17.8
2001	18 902.58	97 314.8	19.4
2002	22 053.15	105 172.3	21.0
2003	24 649.95	117 390.2	21.0
2004	28 486.89	136 875.9	20.8

资料来源:根据 2001、2005 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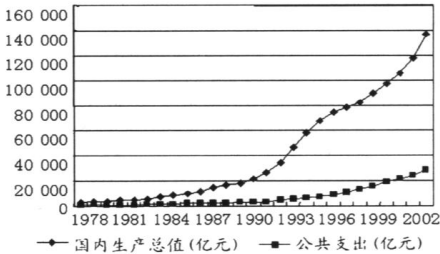


图 1 公共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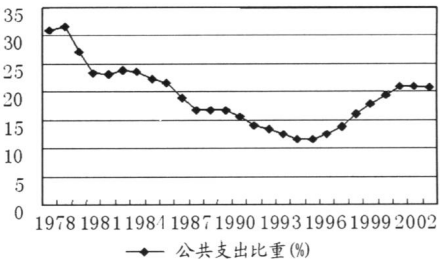


图 2 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2. 公共支出结构的统计描述

从公共支出的内部比例关系来看,中国公共支

出结构的基本情况,如表 2 所示,1978 - 2004 年中国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国防费、行政管理费及其他支出都呈递增趋势(见图 3)。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前,五项费用增幅较小,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五项费用增幅较大,这与公共支出总量的不断增加及其占 GDP 比重在 1996 年后的明显回升是相一致的。从各项费用占公共支出的比例来看(如图 4),经济建设费和国防费一直处于递减状态,社会文教费、行政管理费一直处于递增状态。其中经济建设费递减幅度较大,而国防费进入 90 年代后,比重基本稳定在 8 %左右的水平。社会文教费一直处于递增状态,1980 年已跃升为第二大比重的公共支出项目,至 2004 年已占总公共支出的 26.3 %。行政管理费占公共支出比重除个别年份外,也一直处于递增状态,1986 年占公共支出的 10.0 %,首次超过国防开支的比重,居公共支出的第三位,从 1990 年以来一直在 12 %以上的水平,至 2004 年高达 19.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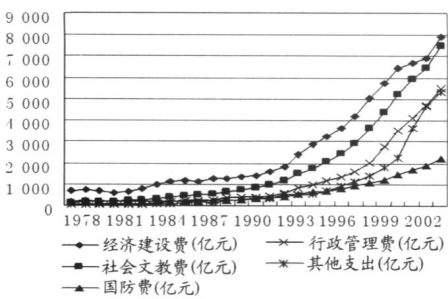


图 3 公共支出结构中各项的绝对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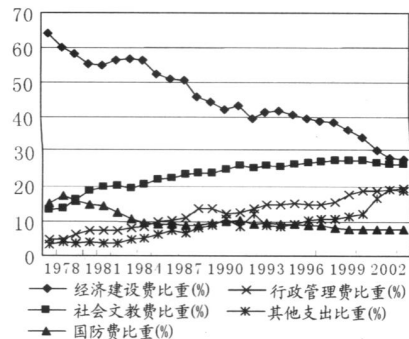


图 4 公共支出结构中各项占总公共支出的比重

表 2 按功能性质分类的公共支出

	公共支出	经济建设费		社会文教费		国防费		行政管理费		其他支出	
		总量 (亿元)	比重 (%)	总量 (亿元)	比重 (%)	总量 (亿元)	比重 (%)	总量 (亿元)	比重 (%)	总量 (亿元)	比重 (%)
1978	1 122.09	718.98	64.1	146.96	13.1	167.84	15.0	52.90	4.7	35.41	3.2
1979	1 281.79	769.89	60.1	175.18	13.7	222.64	17.4	63.07	4.9	51.01	4.0
1980	1 228.83	715.46	58.2	199.01	16.2	193.84	15.7	75.53	13.9	44.99	8.6
1981	1 138.41	630.76	55.4	211.46	18.6	167.97	14.8	82.63	7.3	45.59	4.0
1982	1 229.98	675.37	54.9	242.98	19.8	176.35	14.3	90.84	7.4	44.44	3.6
1983	1 409.52	794.75	56.4	282.51	20.0	177.13	12.6	103.08	7.3	52.05	3.7
1984	1 701.02	968.18	56.9	332.06	19.5	180.76	10.6	139.80	8.2	80.22	4.7
1985	2 004.25	1 127.55	56.3	408.43	20.4	191.53	9.6	171.06	8.5	105.68	5.3
1986	2 204.91	1 158.97	52.6	485.09	22.0	200.75	9.1	220.04	10.0	140.06	6.4
1987	2 262.18	1 153.47	51.0	505.83	22.4	209.62	9.3	228.20	10.1	165.06	7.3
1988	2 491.21	1 258.39	50.5	581.18	23.3	218.00	8.8	271.60	10.9	162.04	6.5
1989	2 823.78	1 291.19	45.7	668.44	23.7	251.47	8.9	386.26	13.7	226.42	8.0
1990	3 083.59	1 368.01	44.4	737.61	23.9	290.31	9.4	414.56	13.4	273.10	8.9
1991	3 386.62	1 428.47	42.2	849.65	25.1	330.31	9.8	414.01	12.2	364.18	10.8
1992	3 742.20	1 612.81	43.1	970.12	25.9	377.86	10.1	463.41	12.4	318.00	8.5
1993	4 642.30	1 834.79	39.5	1 178.27	25.4	425.80	9.2	634.26	13.7	569.18	12.3
1994	5 792.62	2 393.69	41.3	1 501.53	25.9	550.71	9.5	847.68	14.6	499.01	8.6
1995	6 823.72	2 855.78	41.9	1 756.72	25.7	636.72	9.3	996.54	14.6	577.96	8.5
1996	7 937.55	3 233.78	40.7	2 080.56	26.2	720.06	9.1	1185.28	14.9	717.87	9.0
1997	9 233.56	3 647.33	39.5	2 469.38	26.7	812.57	8.8	1358.85	14.7	945.43	10.2
1998	10 798.18	4 179.51	38.7	2 930.78	27.1	934.70	8.7	1600.27	14.8	1152.92	10.7
1999	13 187.67	5 061.46	38.4	3 638.74	27.6	1 076.40	8.2	2 020.60	15.3	1 390.47	10.5
2000	15 886.50	5 748.36	36.2	4 384.51	27.6	1 207.54	7.6	2 768.22	17.4	1 777.87	11.2
2001	18 902.58	6 472.56	34.2	5 213.23	27.6	1 442.04	7.6	3 512.49	18.6	2 262.26	12.0
2002	22 053.15	6 673.70	30.3	5 924.58	26.9	1 707.78	7.7	4 101.32	18.6	3 645.77	16.5
2003	24 649.95	6 912.05	28.0	6 469.37	26.3	1 907.87	7.7	4 691.26	19.0	4 669.40	19.0
2004	28 486.89	7 933.25	27.8	7 490.51	26.3	2 200.01	7.7	5 521.98	19.4	5 341.14	18.8

资料来源:根据 2001、2005 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四、公共支出总量及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框架

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主要

研究的是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它们通过对经济增长过程中要素贡献的分析来解释经济增长问题。之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很多经济学家从这一基本思路出发相继将组织、制度、政府等因素引入增长

分析并建立了相关分析模型。萨缪尔森建立了包含公共支出在内的增长模型,巴罗将政府公共支出引入经济增长分析建立了公共投资模型和壅塞模型。我们根据包含公共物品的萨缪尔森模型和巴罗模型建立一个分析框架对中国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相关性分析。

由于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满足生产函数的一般性质,而且在实证分析中被广泛使用,所以本文假定总量生产函数采取柯布 - 道格拉斯形式,则包含公共支出要素的 C - D 生产函数随机回归方程为:

$$Y_t = A_t L_t^\alpha K_t^\beta G_t^\gamma e^{\mu_t} \dots\dots\dots (1)$$

其中 Y_t 表示第 t 期的产出量, L_t 、 K_t 、 G_t 分别表示第 t 期时的劳动投入量、资金投入量以及政府公共支出量, e^{μ_t} 为第 t 期随机误差项, A_t 、 α 、 β 、 γ 为待估参数。我们可以通过对参数的估计,考察劳动、资本与公共支出对产出的影响。

为了进行公共支出的结构分析,我们在公共支出指数中引入结构变量 x_1 、 x_2 、 x_3 、 x_4 、 x_5 , 它们分别表示:经济建设费(G_1)、社会文教费(G_2)、国防费(G_3)、行政管理费(G_4)及其他支出(G_5) 占总政府公共支出的比重。这样,总量生产函数就可转换为如下形式:

$$Y_t = A_t L_t^\alpha K_t^\beta G_t^{\gamma_1 x_1 + \gamma_2 x_2 + \gamma_3 x_3 + \gamma_4 x_4 + \gamma_5 x_5} e^{\mu_t} \dots\dots\dots (2)$$

分别对总量函数两边取对数可得:

$$\begin{aligned} \ln Y_t &= \ln A_t + \alpha \ln L_t + \beta \ln K_t + \gamma_1 x_1 \ln G_t + \\ &\gamma_2 x_2 \ln G_t + \gamma_3 x_3 \ln G_t + \gamma_4 x_4 \ln G_t + \gamma_5 x_5 \ln G_t + \mu_t \\ &\dots\dots\dots (3) \end{aligned}$$

一般来说,比较自然的思路应该用相应比重分割 G_t , 也就是以下形式:

$$Y_t = A_t L_t^\alpha K_t^\beta [(x_1 + x_2 + x_3 + x_4 + x_5) G_t]^\gamma e^{\mu_t}$$

$$\ln Y_t = \ln A_t + \alpha \ln L_t + \beta \ln K_t + \gamma \ln (x_1 + x_2 + x_3 + x_4 + x_5) + \gamma \ln G_t + \mu_t$$

本文将各项支出的比重引入到公共支出指数中去,主要是出于所得参数经济意义的考虑。因为如果采用这样的函数形式,经过回归分析后得到的参数估计量就具有结构产出弹性的经济含义,它可以清楚地表示出在公共支出规模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其各项支出比重每变动一个百分比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百分比,由此可以看到公共支出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

根据弹性公式,我们可以分别求得衡量公共支出的各项参数指标方程:

$$\text{公共支出的产出弹性: } E_G = \gamma = \gamma_1 x_1 + \gamma_2 x_2 + \gamma_3 x_3 + \gamma_4 x_4 + \gamma_5 x_5$$

$$\text{经济建设费结构产出弹性: } E_{x_1} = \gamma_1$$

$$\text{社会文教费结构产出弹性: } E_{x_2} = \gamma_2$$

$$\text{国防费结构产出弹性: } E_{x_3} = \gamma_3$$

$$\text{行政管理费结构产出弹性: } E_{x_4} = \gamma_4$$

$$\text{其他支出结构产出弹性: } E_{x_5} = \gamma_5$$

以上各式分别表示,在公共支出总量规模不变情况下,某一支出项目比重增长 1 % 时所引起的 GDP 增加的百分比数,这样我们就可以用结构产出弹性来度量公共支出结构的调整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大小。

五、计量模型的设立与具体的计量分析

(一) 计量模型的设立

根据以上的分析框架,建立公共支出总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计量模型 1:

$$\ln Y_t = \ln A_t + \alpha \ln L_t + \beta \ln K_t + \gamma \ln G_t + \mu_{1t}$$

又因为有:

$$\gamma = \gamma_1 x_{1t} + \gamma_2 x_{2t} + \gamma_3 x_{3t} + \gamma_4 x_{4t} + \gamma_5 x_{5t}$$

所以我们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计量模型 2:

$$\ln Y_t = C + \gamma_1 x_{1t} \ln G_t + \gamma_2 x_{2t} \ln G_t + \gamma_3 x_{3t} \ln G_t + \gamma_4 x_{4t} \ln G_t + \gamma_5 x_{5t} \ln G_t + \mu_{2t}$$

式中: C 为模型中的常数项, μ_{1t} 、 μ_{2t} 均为随机误差项。

(二) 数据的处理及模型的计量分析

本文以中国 1978 - 2004 年间数据为样本区间,考虑到价格因素对时间序列的影响使之不再具有可比性,因此我们将所有数据统一折算为以 1990 年价格为基期的不变价。GDP 用 1990 年 = 100 的平减指数进行折算,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以 1990 年为定基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进行调整。对于各项具体的公共支出,由于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属于投资性支出,所以根据 1990 年为定基的投资价格指数对其进行折算,国防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及其他支出近似的以综合价格指数统一进行折算。文中劳动投入量以各年就业人数作为数量指标,真实资本存量的数据采用由 Goldsmith 于 1951 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对资本存量进行测算。基本公式为: $K_t = I_t + (1 - b_t) K_{t-1}$, 其中 K_t 表示第 t 年的资本存量, K_{t-1} 表示第 $t - 1$ 年的资本存量, I_t 表示第 t 年的投资, b_t 表示第 t 年的折旧率。中国一般采用综合折旧率,为了方便起见,参照解三明、马拴友、王小鲁等人的研究与应用, 我们假定 $b_t = 5\%$ 。基期年的资本存量可按照国际常用方法计算: $K_0 = I_0 / (a + b)$, 其中 a 是样本

期真实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 K_0 是基期年资本存量。由于部分公共支出同样形成了物质资本的投资, 与固定资产投资存在重合部分, 因此对这一部分数据将其测算为存量后从真实资本存量中予以剔除。

由于各类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都有一定的滞后期, 因此本文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来确定滞后期, 根据考察结果计算社会文教费滞后 6 期, 国防及行政管理费滞后 2 期是比较合理的。由此可得修正后的计量模型 2 如下:

$$\ln Y_t = C + Y_1 X_{1t} \ln G_t + Y_2 X_{2(t-6)} \ln G_t + Y_3 X_{3(t-2)} \ln G_t + Y_4 X_{4(t-2)} \ln G_t + Y_5 X_{5t} \ln G_t + \mu_{2t}$$

利用计量软件 Eviews3.1, 对计量模型 1 进行回归估计, 结果如下:

$$\ln Y = 3.463 + 0.460 \ln L_t + 0.312 \ln K_t + 0.312 \ln G_t$$

$$\ln Y = 5.904 + 0.308 x_{1t} \ln G + 1.460 x_{2(t-6)} \ln G + 0.496 x_{3(t-2)} \ln G - 0.068 x_{4(t-2)} \ln G + 0.545 x_{5t} \ln G$$

$$S = (1.002) \quad (0.213) \quad (0.257) \quad (0.267) \quad (0.335) \quad (0.247)$$

$$t = (5.895) \quad (1.444) \quad (5.689) \quad (1.857) \quad (-0.203) \quad (2.201)$$

$R^2 = 0.980$, $D.W. = 1.309$, $S.E. = 0.090$, $F = 139.515$, 并且在显著性水平 $\alpha = 0.05$ 下除行政管理支出比重之外每个解释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是显著的, 而行政管理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与中国该项支出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有关。以上回归结果显示: 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国防费、其他支出的结构产出弹性系数为正, 表明上述支出部分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其中社会文教费结构产出弹性远高于经济建设费的结构产出弹性说明中国对人力资本投资比对物质资本投资更能促进经济的增长。究其原因可能在于, 一方面中国对于社会文教的支出大大低于经济建设支出致使其具有更高的边际收益; 另一方面经济建设支出内部结构的不合理削弱了它整体对经济增长应有的促进作用。行政管理支出的结构产出弹性为负表明在中国这种纯消耗性的支出已超过了最优规模, 其比重的增长并不能促进经济的增长, 反而会挤占其他支出应有的份额, 降低总公共支出的效率, 阻碍经济的增长。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 即使公共支出总量规模保持不变, 调整各支出项目的比重、优化公共支出结构同样可以提高整体公共支出的产出弹性, 促进经济的更大增长。

(三) 公共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公共支出的目标是满足社会共同需要, 但是却可以为私人生产提供必要的条件, 降低私人生产的成本、提高私人生产的效率, 因此公共支出规模的适度扩张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是相当必要的。但是另一

$$S = (0.312) \quad (0.377) \quad (0.068) \quad (0.054)$$

$$t = (11.086) \quad (1.218) \quad (4.565) \quad (5.765)$$

$R^2 = 0.993$, $D.W. = 0.350$, $S.E. = 0.066$, $F = 1043.06$, 并且在显著性水平 $\alpha = 0.05$ 下除就业人数外每个解释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是显著的, 而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可能与我国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特殊情况有关, 这并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C-D 生产函数的弹性之和反映产出的规模报酬情况, 以上回归结果显示中国劳动、资本及公共支出三要素的产出弹性之和约等于 1, 规模报酬不变。当前中国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公共支出规模并未达到巴罗所指的最优规模。

对修正后的计量模型 2 进行回归, 得到:

方面, 由于公共支出存在“挤出效应”, 即公共支出扩张将引起利率上升, 利率上升又会抑制民间支出, 特别是会抑制民间投资的增长, 从而阻碍到经济的增长。本文计量模型 1 的回归结果显示, 在公共支出结构既定前提下, 中国的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在总体上发挥正的作用, 即公共支出每变动 1%, GDP 会同方向变动 0.312 个百分点。当前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之中, 随着市场经济秩序的逐步建立、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能力加强、政府公共支出逐渐从竞争性的领域退出, 引起公共支出比重下降, 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其合理性。但是根据马斯格雷夫与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 中国当前仍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 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市场体系, 而这一活动的进行需要政府的积极参与, 如基础设施的建立、法律体系的完善、公共秩序的形成等等。即一方面政府通过增加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可以为私人投资的跟进创造条件, 为经济起飞创造条件, 推动经济的增长; 而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支出在某些公共服务领域的产出将大大高于私人投资产出, 需要政府公共支出的投入。由此可见, 虽然经济增长不是主要依靠政策推动而是市场力量, 但出于以上两个方面分析的需要,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具体阶段仍然要求公共支出为其提供必要的条件, 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应该淡出, 而是应当转型, 对其流量与流向进行调整。

(四) 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公共支出的总量大小反映着政府介入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规模与深度,体现了政府的经济职能。但是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而且也体现在结构关系上。公共支出结构的状况会直接影响公共支出效率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方向,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变动的去向。

1. 经济建设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建设支出是一种生产性的支出,一定的经济建设支出为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提供必要的外部条件,可以提高私人的产出能力。但是过多的经济建设支出就会排挤私人部门支出,并与私人部门争夺有限的社会资源,阻碍经济的增长。从计量模型2中对各变量回归分析的结果说明,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支出的结构产出弹性为正,即在公共支出总量规模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建设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重每增长1%,GDP将会上升0.308个百分点。但这一数值远低于社会文教支出的1.460个百分点,也略低于在总公共支出中所占比重并不太高的国防费的0.496个百分点和其他支出的0.545个百分点。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社会文教费结构产出弹性远高于经济建设费的结构产出弹性的原因可能在于两个方面:其一,中国当前对社会文教的支出相对于经济建设支出较低,从而使得每增加一单位社会文教支出所带来的边际收益是高于经济建设支出的;其二,经济建设支出内部结构不合理削弱了它整体对经济增长应有的促进作用。中国公共支出当前投向政府不应涉足的以盈利为目的的或以市场为导向的国有企业的支出过多,而投向本应成为支出重点的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或是有自然垄断性的准公共产品的部门或企业的资金明显不足,这种内部结构的扭曲使得经济建设支出难以对经济增长发挥应有的作用。基于以上分析,当前阶段中国的经济建设支出比重仍有上升的空间,而最关键的是其内部结构需要优化,对于一般的竞争性领域公共支出要逐步退出,以集中有限的支出强化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和重要产业的投资,以促进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的升级。这样经济建设支出的效率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提高,更大程度的满足经济发展需要,使公共支出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2. 社会文教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形成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而贝克尔教授在其经典著作《人力资本》一书中曾指出:个人的教育和训练就像企业的设备投资一样,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社会

文教支出形成了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从理论上说,它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与技能,推动生产率的发展,因此社会文教支出的增加可以对经济增长产生正的影响。本文计量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中国社会文教支出的结构弹性为正,即在公共支出总量规模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社会文教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重每上升1%,GDP将上升1.460个百分点,这远远高于经济建设支出的结构产出弹性(原因如上所分析),也远高于国防费和其他支出的结构产出弹性,是中国当前公共支出结构中对经济增长贡献度最大的一项支出。中国当前公共支出中用于社会文教支出的比重较低,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出发,对于当前公共支出结构的优化,应当从总量和比重两方面提升社会文教支出的重要性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促进经济的更快增长。

3. 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国防支出可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对于安全的消费需要,是保卫国家安全及形成和平建设环境所不可或缺的支出。在公共支出总额既定的前提下,国防支出与非国防支出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国防支出的扩大会耗费有限的社会资源,挤占其他项目的支出,从而影响经济的增长。但同时国防支出中某些生产性活动会直接拉动经济发展且会产生许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外部性。武器装备的生产技术可以用于民用产品的生产,军事上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会推动整个国家技术水平的发展,推动国民经济现代化,从而提高社会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本文计量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中国国防支出的结构弹性为正,即在公共支出总量规模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国防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重每上升1%,GDP将上升0.496个百分点,这一数值是略高于经济建设支出的。由此也表明,当前中国国防支出的比重并未超过最优点,仍然存在上升的空间,而且由于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的外部性,我们应该在可能的情况下保证它支出的比重。

4. 行政管理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标准的资源配置理论来说,社会总资源最终不是用于投资,就是用于消费。当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时,增加政府消费性支出能扩大社会总需求,提高现有生产能力的利用,特别是提高现有资本存量的利用,进而提高利润率,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拉动作用。但同时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消费性支出过多的增加会挤占生产性支出应有的份额、导致社会总投资减少,可能会阻碍到经济的增长。行政管理支出是一种纯

消耗性的支出,通过对中国 1978 - 2004 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得出中国行政管理支出的结构产出弹性为负,即在公共支出规模既定前提下,行政管理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重每上升 1%,GDP 将下降 0.068 个百分点。由此看来,当前中国公共支出的相当部分被用于应付行政管理支出的不断膨胀。行政管理支出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其应有的份额,并挤占了其他项目所需的支出,从而削弱了整个公共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这一分析结果与中国行政管理费用的现实状况是一致的。行政管理支出是政府履行其职能的财力保障,但其纯属非生产领域和消费性质,中国目前行政体制改革滞后,机构臃肿,行政管理费用呈现加速膨胀的态势。因此在中国公共支出结构的优化过程中,行政管理支出的比重迫切需要进行控制和调整。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公共支出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之一,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总量联系上,而且公共支出结构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公共支出结构的安排与公共支出总量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大小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对中国 1978 - 2004 年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公共支出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其产出弹性约为 0.312,而这一弹性值的大小又部分地取决于公共支出结构的安排。经验分析的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建设、社会文教、国防、行政管理、其他支出占总公共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的结构产出弹性分别为 0.308、1.460、0.496、- 0.068、0.545,由此可见各具体支出项目所占比重高低的变化会导致整体公共支出产出弹性的变化,从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小也会发生变化。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效应的不同主要也是由其公共支出结构的差异所引起的。

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不仅验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共支出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且也反映出了中国公共支出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据此,中国今后财政支出政策调整的方向在于优化公共支出结构,调整公共支出重点:

1. 在提高公共支出总水平的同时,政府应注意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率。对公共支出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分析表明,在 1978 - 2004 年间,中国公共支出总水平的增加对于经济增长起到了正的效应,其产出弹性为正的 0.312 表明它并没有达到 Barro 所指的最优规模,继续增加公共支出可以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是从中国转型期的现实出发,在确保

公共支出合理增长的同时更应当注重公共支出效率的提高。公共支出效率的提高是在界定和规范公共支出供应范围的前提下,明确公共支出分配的依据,强化代表社会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社会公共性开支,有效解决财政支出能力低下与财政资金损失浪费并有的现象。

2. 在积极财政政策继续实施的同时,要以公共支出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为重点。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体现在公共支出的总量关系与结构关系两个方面,公共支出结构的不合理将会降低公共支出整体的效率,削弱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应有的拉动作用。本文计量模型 2 的回归结果表明,对公共支出结构进行优化可以在不扩大公共支出规模的情况下,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应当淡出,而是要以调整公共支出结构为重点。在公共支出的战略性调整中,着力解决公共支出中“越位”与“缺位”的矛盾,力求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支出结构框架,促进财政政策转型。

3. 公共支出结构的调整措施应当根据各支出项目结构产出弹性的大小而定。中国 1978 - 2004 年数据经验分析的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建设、社会文教、国防、行政管理、其他支出所占比重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分别为 0.308、1.460、0.496、- 0.068、0.545,也就是说同样提高一个百分比某项支出的比重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是截然不同的。在生产性的支出结构中,经济建设支出结构产出弹性要远低于社会文教支出,因此在两者间的选择应该更倾向于后者;在非生产性的支出结构中,国防支出与行政管理支出虽然都属于一种纯消耗性的支出,但是当前中国国防支出结构产出弹性为正且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的外部效应,而行政管理支出结构产出弹性却为负,因此在公共支出结构的非生产性结构中应当调整国防支出比重,而相应控制行政管理支出的比重。

4. 确定公共支出及其结构调整的依据,强化公共支出管理。从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结果来看,优化结构是确保公共支出长期持续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而优化结构的前提是确立公共支出的依据,强化公共管理。在公共支出的依据确立方面,把满足社会共同需求和实现社会长远利益作为确定公共支出供给的标准,在公共支出结构的优化过程中强化代表社会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科技、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支出。在强化公共支出的管理方面,建立健全公共支出的管理与控制机制,有效控制公共支出的流量与流向。推进公共支出预

算管理制度创新,促进公共财政新框架和新的运行机制的建立。健全支出管理体系,在支出管理方式、手段和评价标准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制度创新,提高公共支出资金的配置效率和使用绩效。

注释:

何振一、阎坤:《中国财政支出结构改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牟放:《论界定我国公共支出范围的标准》,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1(8)。

解三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和经济周期研究》,168页,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1。

马拴友:《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100~102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王小鲁、樊纲等:《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跨世纪的回顾与展望》,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Becker, G. S., 1993.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参考文献:

1. 张军、章元:《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载《经济研究》,2003(7)。
2. 纪宝成、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研究

报告2002》,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 邓子基:《现代西方财政学》,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

4. 郭庆旺、赵志耘:《财政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5. 舒元、谢识予、孔爱国等:《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6. 牟放:《借鉴公共支出增长理论调整我国财政支出政策》,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1999(9)。

7. 吴晓、元同进:《我国公共支出的规模增长和结构优化》,载《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6)。

8. 余天心、王石生:《关于财政支出结构的国际比较分析与建议》,载《财贸经济》,1997(2)。

9. 王雍君:《建国以来公共支出结构的演变》,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1999(10)。

10. 马拴友:《财政支出职能结构的国际比较》,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1999(11)。

11. 陈颂东:《财政支出结构的国际比较与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载《改革》,2004(1)。

12. 杨继、杨卫:《内生增长中的公共支出理论综述》,载《经济学动态》,2003(5)。

(以下文献略)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西安 710069)

(责任编辑:N、K)

(上接第20页)

$$\left(\frac{dy}{dt}\right)' = b^4 \ln^2 b + d^4 \ln^2 d > 0 \quad \dots\dots\dots (5)$$

由此可知:y对于t是递增函数,即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重要。

总之,由于以上原因经济学与管理学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但是两者之间因为研究目的的不同而形成了诸多区别是不可抹杀的。它们之间紧密的联系也是为了更好的独立发展,而不是被对方同化或融合为一体。因此,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在研究共同关注的社会经济问题时要从研究的目的上去把握方向,履行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各自不同的责任,这样经济学与管理学才能沿着自身的轨迹不断发展和创新。

注释:

赵雪章编:《彼得·德鲁克管理思想全集》,1页,北京,长安出版社,2006。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文版,上册,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中文版,上册,10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曼昆:《经济学原理》,中文版,上册,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斯蒂芬·P·罗宾斯等:《管理学》,中文版,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参考文献:

1. 高核:《管理学与经济学的融合及未来发展》,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1)。

2. 乌家培:《与时俱进的经济学和管理学》,载《学术研究》,2004(9)。

3. 陈通、赵成:《多维视角中的交汇——论经济学和管理学》,载《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5(4)。

4. 宋承先、许强:《现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5. 宋承先、许强:《现代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6. 蒋中一:《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7. [美]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中文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8. [美]高山晟:《经济学中的分析方法》,中文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9. 杨瑞龙、宋利芳选编:《西方经济学经典名著选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0. 周三多:《管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11. 芮明杰:《管理学:现代的观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2. [美]海因茨·韦里克等:《管理学——全球化视角》,中文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13. 孙耀君:《西方管理学名著提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

14. 黄速建、黄群慧:《管理科学化与管理学方法论》,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作者单位:河海大学商学院 南京 210098)

青岛大学 青岛 266071

孝感学院 孝感 430000

青岛大学国际商学院 青岛 266071)

(责任编辑:N、S)